

# 2018年《人民文学》:新标尺的生成与经典之维

□赵 依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学在历史机遇中不断自我革新,成果斐然。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纪念,我们可从文学的帷幕探看复兴的艰辛和坚定圆梦的宏阔征程。时代精神作用于文学风尚,文学与时代一路相伴,一起见证,一同成长,这些,为我们在岁末盘点2018年《人民文学》提供着更为必要而深远的意义向度。

## “新时代纪事”与新文学标尺

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新时代纪事”栏目设立于2017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2018年,《人民文学》将“新时代纪事”作为重点栏目,持续传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风貌、新英雄、新天地,栏目作品紧扣当下现实题材创作、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等重大文学命题,在分享人民的新生活、新感受的同时以文学的视界呈现相关内蕴的厘清。

欧阳黔森《报得三春晖》将“攻坚脱贫”写得掷地有声,多次深入乌蒙山区的耳闻目睹使作品于伟大创举的大气磅礴中显现人的真情与真心;《看万山红遍》将社会转型与观念之辨重叠于一方水土,作品经由一种具体思考的形成铺展起更为宏阔的抉择与征程。陈毅达《海边春秋》以小人物为线索展开攻坚克难主题,小说里对现实的洞悉与发问、对复杂真实的虚构、对干部成长与青年问题的关注以及直书其事的价值判断,将海岛的故事写得有“史”有“诗”。赵雁《星空并不遥远》延续着她关于航天事业的报告文学写作图谱,高深莫测的科学架构以文学凿壁引光,艰苦的科研以人物内心的细腻体验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开。李朝全《梦工场追梦人》同样关注科技与青年,创业时代与青年梦想在纪实的踏实呈现中被渐次开启,一己之梦汇入国家发展,进而焕发无穷的潜能。

经由一年的编选打磨,“新时代纪事”已从新栏目的创立演进为一种新文学标尺的设立,新时代的文学事业,关于人的本质命题、价值定位的沉雄思考,作品的书写方向、精神坐标、气象格局等,理应回应激荡的宏大现场,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应存活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依凭、以家国为根底、以传统为基础、以世界为参照的场域之中。我们也可从其他延续性板块中觉察这一标尺,李彦《何处不青山》发表于“非虚构”栏目,作品以鲜活事件塑造白求恩纯真率性、满怀激情的丰满个性,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人性复杂深邃中散发切实的光辉。“剧本”栏目刊发了步川、李蓬获的现代戏《方志敏》,对弋阳高腔特点的创新性继承为物心理的表达提供艺术便利,浓郁的生活气息把读者的情感共鸣不断引向家国大爱,方志敏崇高的革命精神融于剧本文体特色,以鼓为节、调喧亢亢的唱词是人心与信仰之歌。此外,2018年《人民文学》以专号的形式于第6期推出“少儿成长主题”,关注新时代孩子的“成”与“长”;于第8期推出“强军文化主题”,彰显新时代家国气象。

## 作家作品与渊源勘探

新时代的《人民文学》树立起自身独特的表达,文学要进入生动丰繁的现实内部,要以审美的样式

呈现文学和发展的规律与旨归。而无论是宏大主题书写还是微观生活描摹,我们从中明见着《人民文学》与作家队伍之间长期保持的坚实信赖关系、持续互补能力和在场倾听效用。

从2017年第9期“莫言新作”的推出到2018年第5期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的刊发,《人民文学》以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向读者推介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莫言不局限于“红高粱家族”既有的设定,将新的民间想象和世情伦理诉诸历史的关节,文本的舞台陈设与人物的动作心神活化一体,文学的影响空间在重重叠叠中愈发开阔。

有些缘分则在第12期形成巧合,《人民文学》在2017年第12期刊发了宗璞先生《北归记》(前五章),典雅的文本作为“野葫芦引”系列长篇“东西南北”的压轴之作,再次彰显青春叙事的粲然魅力;不久前,2018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徐怀中先生长篇新作《牵风记》,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汪可逾、曹水儿、齐竞等人物原型源自作家当年的亲历,汪可逾壮烈牺牲后肉身不腐、保持前进姿态站立于一棵银杏树洞等情节写得奇巧而出乎想象,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又因人性的高华和强烈的哲思闪烁着现实主义的深沉质地——两部作品出刊之际,两位先生与《人民文学》的缘分正好一甲子,宗璞先生1957年发表的成名作《红豆》无疑是当代文学史经典,徐怀中先生从1958年第4期发表《卖酒女》到1960年第2期的《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西线轶事》等,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在《人民文学》可亲可敬的作家作品里被不断开启。

《人民文学》的艺术探索也致力于对文学新人的挖掘扶持。我们往往从年轻人那里最先觉察多元化的格局,各种生活与观念相互碰撞、交织,尚未完全成型的现状、理想及其审视正借由文学抵达其探索的功用,关于人性异化、精神困局等问题的审美情感与智性呈现既昭示着年轻人敏锐的文学自觉,也显露出《人民文学》对青年写作发展的独到眼光和包容心态。2018年,《人民文学》继续设立“90后”栏目,先后刊发小托夫、韵竹、谈衍良三位作者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民文学》注意到这批青年作家集体登场,创作风格饶有新趣,作品里时代新人形象层出不穷,于是在2017年以代际命名开设栏目,以便为他们的写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人民文学》作为国刊之所以未率先设立此类栏目,主要在于对命名产生的局限性始终保持警惕和迟疑,而在这一问题,《人民文学》已有意识进行了必要的补白和权衡——

2018年《人民文学》的“新浪潮”栏目继续推出各类文体的佳作,李锐的《午夜电影》精致婉转、曲径通幽,吴莉莉对秘密的闯入关联故事的整体深度和人物的心理景深,小说以隐秘的空白诉说某种难以厘清的敬畏心愿;第5期的“诗歌”栏目推出“青年诗人小辑”,年轻诗作者们各自从语言、结构、经验、精神向度等层面展现诗心的纷然风貌,文化经验里



的后现代属性及其生活情态的片段化、日常化横生于“诗”与“思”。徐衍的《天边一朵云》和唐糖的《张小野的环球旅行》透露出作者细腻的洞悉力和天然的悲悯心,这也是我们对青年作者充满信心的源泉所在。

## 文学生态格局:范例与可能

从《人民文学》2018年刊发的各类作品来看,刊物理念作为一种文学想象的逻辑和新的文化创造正与文学现场、文学生产形成着由内而外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出的高品质作品不仅促进着良好文学生态格局的形成,也为当前文学发展的诸多问题提供范例。

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以生命书写关注老龄化问题,小说以“万寿公园”的七个黄昏摒弃时空关系上的逻辑惯常,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超乎真实生活的直接因果对照,人的精神、生活的荒诞在文本内外和真实与虚构两端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袁山山《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以宽悯之心体恤老境,幽默家常中有隐痛心曲。弋舟《如在水底,如在空中》攸关丧妻之痛和遥远承诺,小说以超高的精神难度跳脱常理常性,彼世界里既实在又神秘的生命图景为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世界提供写作范式。骆平的《过年不食》同样关注社会热点,“二胎”的孕育剖白家庭成员内心的“公”与“私”,从而进行了一场亲缘伦理关系下的深刻揭示。

葛水平的《活水》和陈集益的《金塘河》写山乡巨变,难言的取舍和由衷的悲喜无一例外地回响在历史的延递和时代的更新处,后者的父亲形象饱满扎实。李凤群《大野》同样围绕巨变建构起自我写作的诸多新质,通过今宝和在桃两位主人公相洽的话语方式架构起40年间有关家乡与外界的心况神

# 当文化进入叙事

——评曹学林长篇小说《船之魅》 □周卫彬

《船之魅》中俯拾皆是关于“文化”这种习焉不察的“暗物质”的呈现与复原,以特写式的笔触,将里下河乡民对于一方文化朴素而浓郁的情感直接裸露于故事之中,除去“清明篙子会”这一最为重要的民俗之外,全书大概有上百处言及里下河的各种习俗与风情,事无巨细般的描述,最终在小说中形成了里下河文化的强大气场。

化朴素而浓郁的情感直接裸露于故事之中,除去“清明篙子会”这一最为重要的民俗之外,全书大概有上百处言及里下河的各种习俗与风情,事无巨细般的描述,最终在小说中形成了里下河文化的强大气场。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要让文化与小说的人物、情节等形成某种天衣无缝的弥合,以此抵达“魅”之深处,必须形成某种“对位”关系,也即是作家在创作中,必须将小说的虚构性与文化的原生性相互融合,这不仅需要呈现文化之“魅”的功底,更需要作者具有担负起叙事可靠性的能力,因为当文化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有意无意对小说形成某种障碍。正如赵吉、柳一篙、李恒义首先要经历各自曲折的人生,这个经由各种世变、苦难、际遇、波折与心灵的焦灼,进而由小说法则建立起来的规范性的世界,方才让婚丧嫁娶等习俗具有了生老病死般的人生意味。

如果说《船之魅》是里下河文化的宏伟建筑,那么它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小说内部的结构问题。在这部充满“文化感”的小说中,具有真实感的人生与各种历史风俗,并不是贴近现实与遥远梦幻的循环关系,需要之处则有,不需要则无,而是正因为对世人的漂泊与动荡(小说从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的岁月),围绕“生存”与“生子”的各种西绪弗斯式的挣扎,那种沉默而恒定的历史文化,才形成了对人物的暗示和诱惑。也即,文化不仅作为叙事者的观察对象或是作为人物描写的环境背景,还承担着叙事的重要功能。习俗因而也具有了某种人生美学的意味。正如,我们在小说中看

到,无论是在动荡年代(譬如抗战胜利)还是安稳的现世(台胞回乡),乡民内心渴望的篙子会皆具有一种令人目眩神秘的神秘力量,当然,曹学林并没有标榜历史文化的神秘,而是通过捕捉柳一篙、李恒义等个体的人生动荡与心灵现实来实现的,在此,篙子会并不仅是小说的叙事线索,也不仅是为了营造小说的独特氛围,而是它本就是里下河水乡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乡民人生中的重要形式,正是小说传达出的这种文化与人生的“通感”意味,文化因此才可能上升为叙事的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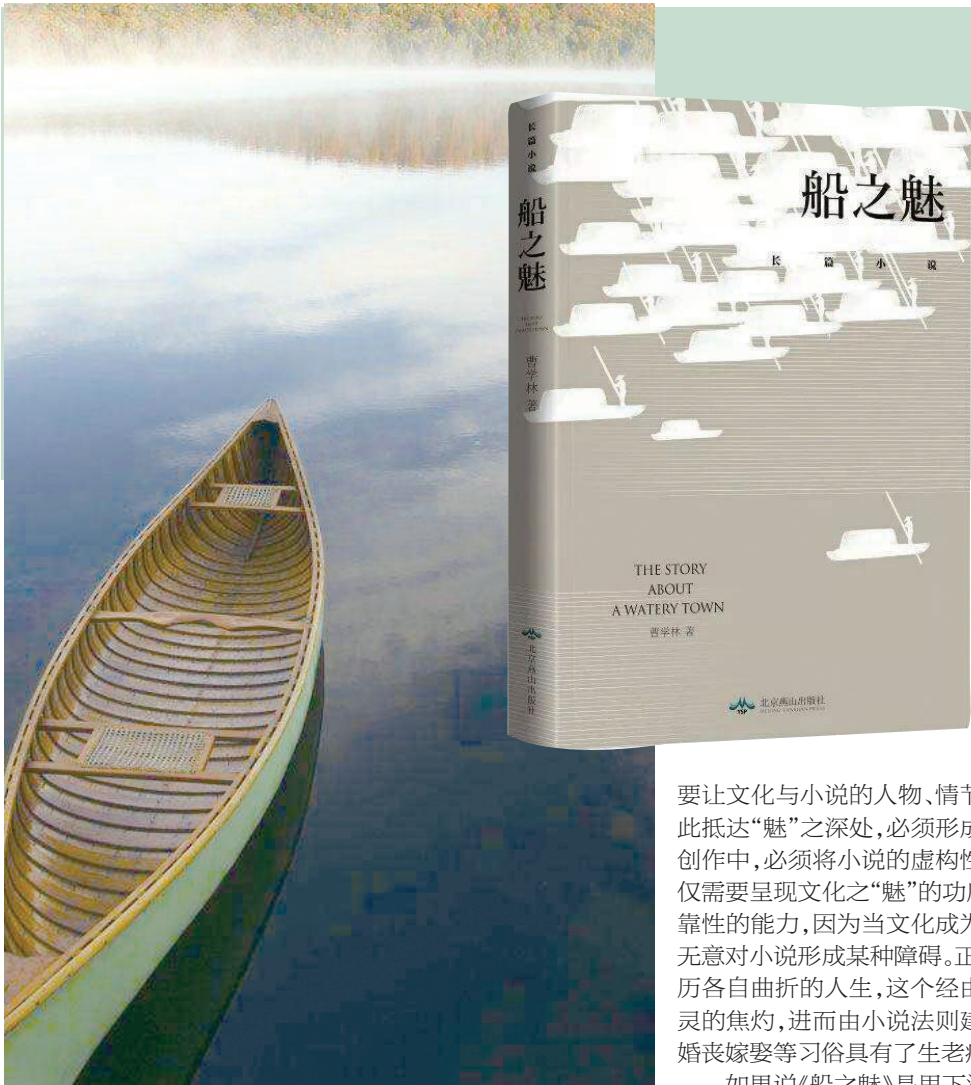
在这一点上,曹学林看似随意的点染,其实是有意为之,众多繁复的习俗在情节的烘托下连缀成篇,充满了强烈的细节真实感,文化叙事由此展现出具体可感的特征。因为船之“魅”,不仅也不能仅局限于篙子会,而是必须以众星捧月的方式,既侧重于“会船”,又将水乡特有的各种营生、习俗乃至伦理道德等弥布其间,这种将文化生活化、情节化、美学化的处理方式,有效解决了小说叙事与文化叙事双线融合,这也是这部文化小说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才因此得以进入那个到处是水,必须撑篙的里下河。

除去这种小说内部的文化叙事逻辑,《船之魅》具有一个类似于复调小说的非常别致的外形,它让我想起略萨的《胡丽娅姨妈与作家》,但是与略萨做法不一样的,这部小说的单章与双章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单、双章的交替,在这种情节的藕断丝连与因强韧的文化力量的牵绊而背景一致的,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架构。藉由“记忆”“习俗”与“叙事”的交织而呈现出的里下河乡土文化空间,既有外在化的、客观性的空间世界(地域的、文化的),篙子会的前世今生,历历如在目前,也有内在化的、主观性的情感世界(伦理的、人性的),赵吉与采薇,柳一篙、李恒义与沈红菱之间的复杂的情感世界。曹学林不仅展

示了他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功底,更是从里下河乡土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借“生子”这个民间伦理的聚焦点,写出了家族史般的生动画卷,体现出对小说艺术的追求。以此,看似遥远的两个世界(当下的与历史的;理想的与挫折的;悲剧的和喜剧的)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关系,产生了间离的叙事效果。曹学林借助赵吉对篙子会历史的打捞,一方面翻出了几个家族昨日与当下的心路历程,也映照了龙潮镇几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并在小说中成功营造出了某种“文化记忆场”,也即是说,在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与历史、文化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我们借助赵吉的视角,体会到了一种如米兰·昆德拉所言的“认识的激情”,这并不是“恋旧情怀”与“挽歌意绪”作祟,而是一种对里下河集体记忆的认同,这也是曹学林书写“篙子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换言之,正是这种将文化、历史与叙事加以等量齐观的做法,小说具有了某种史传的色彩,因为当文化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介入小说的时候,都不会是单一的剖面,而是至少可以分作对于文化本身的认识(这是小说的认知基础)和小说与文化之间的互相支撑(这与小说的叙事混合在一起),譬如赵吉、柳一篙、李恒义在各自文化身份上虽然不同,是所谓“观念的产物”,但是在小说意义上其实是一类人,是里下河文化背景下、命运载浮载沉的普通人。如果我们在这部小说的单章中,看到了后人基于自己的时代和观念对前人习俗的承继,正如赵吉是作为一个文化传承者出现的,那么双章则意味着,前人对这种习俗的选择所作的不懈努力,反映出人的生命状态,展现出饱满、丰富而生动的情感和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船之魅》既是一部里下河文化史,也是一部里下河人的心灵史。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文联创作部)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重要作家之一,曹学林长期浸润于地方文化和乡风民俗研究,汲取民间叙事的营养,其长篇小说《船之魅》,藉由两个家族围绕生子而发生的情感纠葛,对“篙子会”这一里下河独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与想象,构筑里下河文化的“记忆场”,既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观察乡土社会的视角,也彰显出独特的小说风格与审美意趣。

《船之魅》中俯拾皆是关于“文化”这种习焉不察的“暗物质”的呈现与复原,以特写式的笔触,将里下河乡民对于一方文